

日本看起来似乎变化很大， 但其实本质上几乎没变

相信有许多人还记得电影“KENNY the KID brother”，以及那位蓄着鬍鬚、留着长发，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导演。这位导演克劳德·盖农（Claude Gagnon），在日本的名气比任何国家都要高。盖农在日本拍摄的成名作“Keiko (1979)”，不但使他扬名国际，更加深了盖农与日本的羁绊。他执导过许多作品，而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Kamatagi”以及全片在冲绳拍摄的最新作品“KARAKARA”。后者描述的是一名退休后，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平静而从魁北克来到冲绳的学者，与一名为家庭生活问题所困的日本女性之间的故事。该片今年一月在日本上映后，佳评如潮，并获得许多奖项。这次，克劳德·盖农导演在东京接受了JQR的专访，畅谈他与日本的关系。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一般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去法国，但我的人生至今，从来没做过和别人相同的事。当时我想要找到一个无论在文化、宗教、哲学及地理等各方面，都和我所熟知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国家。

1960年代，我为了拍电影而离开名校，放弃研究传统学问，而在1968年，我为了探求书本以外的世界，用搭便车的方式前往了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在举办奥运，因此我想去见见世面。不知为何，旅途中，我突然发现我对于美国竟然一无所知，我对美国的认知，仅限于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当时，有一位黑人让我搭他的便车，载我过桥后，还给我5元美金，因为他可怜那时没有

我在美国南部搭了一位开着皮卡车的男子的便车。那是一辆真正的皮卡车，男子戴着帽子、手持卡宾枪，一脸怀疑地望着为了追求当时的流行而蓄着鬍鬚和长发的我。幸好我是个运动健将，而且很喜欢美式足球，因此当男子提到一位出身德州、在加拿大联盟打球的选手时，我立刻回答：“Oh! My favorite! (我是他的球迷!)”于是博得了他的好感。他把我载到理发院前，还给我一些钱让我剪头发。我走进理发院后，便躲在暗处看着他，直到他离开。这个经验，让我开始思考“人怎么看别人，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对我是一种启蒙。

我喜欢完全改变社会的 既定印象

美丽的女性，总是知道人们是怎么看自己的。她们知道，当自己走进某个地方的时候，视线就会聚集在自己身上。我在自己的作品里，总是会特别强调人的外表。年轻时，我打冰上曲棍球，不过因为我就读的是名校，因此外面的人总以为我是个书呆子；可是在学校里，由于我是个运动健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是“Jock (运动型的人)”。人们会依照自己的印象，替别人贴上各种标签——对于这个事实，我至今仍感惊讶。

我早期拍了一部由理查·尼凯特 (Richard Niquette) 主演的电影，叫做“Larose, Pierrot et la Luce”。我从很久以前就认识理查 (理查·尼凯特) 了，他身材矮小肥胖，穿着吊带裤，还有点驼背。13岁的

Interview

Film director, Claude Gagnon

Photo / Yosuke Suga Texte / JQR

地方住，而在拘留所度过一晚的我。对于当年18岁的我来说，这个经验跟我在书里学到的知识完全不同。一个读了萨特和卡缪，就以为自己懂得一切的年轻人，就这样被丢到现实世界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以来对美国人抱持的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偏差的。

时候，看起来就已经像是50岁的中年男子。我在学校是个出了名的运动健将，只要稍微摆出兇一点的姿态，大家便相当害怕。之后，我便经常往返日本与魁北克间；某次当我回到魁北克时，理查问了我一个令我震惊无比的问题：“你因为我是同性恋，所以讨厌我吗？”原来他一直因为我的体型，而以为我

是一个讨厌同性恋的肌肉男。这世界就是如此，甚至连一个人的内心宽阔与否，都用外在来评断，这件事对我的电影造成莫大的影响。每每在选角的时候，我都会特别重视这种第一印象；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完全改变社会对外的既定印象。

对我来说，日本是完美的

结束了搭便车之旅后，我体悟到，想要拍电影，就不能只靠书本，而必须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必须和人们接触、发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状况。于是，我认为日本无疑是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日本是一个岛国，又有山……相对于属于新兴国家的加拿大，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这么一想，我便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于是，我在70年代来到了这个国家。

起初我计划先在日本待半年，接着南下前往印尼，最后再北赴欧洲。我想要迎合当时的风潮，进行一趟小小的流浪之旅。然而，

当6个月过去后，我对日本却仍一无所知。当时住在日本的外国人非常稀少，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在京都遇到外国人时，总是会越过马路，去向对方握手，还交换电话号码。那是一个以“和平与爱”为暗号，充满幸福又刺激的时代。

我是只要跨出片场一步，就会变得非常内向，就连在店里买个东西都会莫名紧张的人，因此我非常喜欢日本人的内敛。

话虽如此，日本的传统文化，也让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我感到困惑。对我来说，那与其说是挫折，倒不如说是一种冲击。我不断地问自己至今的经验，努力去发现新想法、新美学。当我以“Keiko”赢得成功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沉浸在这个环境中，并觉得非常舒适。我生了两个小孩，正打算开始以一个小市民的身份，展开家庭生活；在事业方面，也突然有许多工作上门。但这时找上门的，都是想要我拍出像“Keiko”般的作品，也就是宛如将我过去的作品重製的工作，因

此我一点都不感兴趣。这种状况让我感到恐慌，于是产生想回魁北克的念头。

对我最大的冲击：福岛

现在的日本和当时确实不同，但我认为不同之处仅只于表面。乍看之下，虽然表面上有着戏剧性的变化，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像现在仍看得见年轻人集体行动的状况等等，让我惊讶的现象不胜枚举，或许那是一种能令人安心的行为模式。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比别的国家更优秀，然而我始终主张，只要是地球上的居民，就应该至少花一年的时间，去外国居住看看。重要的是，要去发现外国与自己国家的相异之处。对我来说，日本有许多我觉得很理想的地方，当然也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我认为对个人来说，日本社会太过于拘谨了；而每个日本人其实也还没做好打破这道墙的准备。

至今最令我难过，同时对我的日本生活造成最大冲击的，就是福岛的核能发电厂事故。对国民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说谎的政治家们，令我极度失望。另一方面，国民的反应也太迟钝了，在外国，只要有人敢欺瞒社会，人们便会大力反弹，民主主义就是为了改变政府而存在的。

我平常虽对政治没什么意见，但是看见那些正大光明表达拥核立场的政治家连续当选，我不禁感到失望。如果日本要建造新的核电厂，那我一定会离开日本。就算住在距离核电厂非常遥远的冲绳，我也无法接受这件事。我对于日本人普遍欠缺站出来表达抗议的霸气一事感到愤慨。“为政者”熟知控制人心的方法，东京电力公司也对所有电视公司施加压力，并四处撒钱，但人们却没有说出“钱不重要，来，我们展开突击！”的勇气。日本其实一点都没有变——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就在这里。

不同是日本对我的冲击

但我并不想一味地否定日本，日本是个充满了“悖论”的国家，而这点是非常具有刺激性的。我经常遇到许多看似无意义的事物，然而一旦环境做好了准备，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便突然间有了意义。我总是对首次来到日本的外国人说：“等等，先别急着下定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轻率地评断一个我们并不理解的文化。原本只预定待在日本6个月的我，之所以将留在日本的时间延

长到好几年，正是因为我不断反覆“受到冲击、发现新事物”的过程。

我一直在拍摄我自己称之为“mirror cinema（镜子电影）”的电影；也就是不带任何评价，只反映出社会样貌的电影。我所呈现的东西究竟是不是现实，而该现实是否理想，全都交给各位观众来判断，我的电影皆以这样的问题为主轴。我的人生至今，每天都在问自己：我是什么人？为什么我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此外，人类的软弱总是特别吸引我，不论一个人多么坚强，也都一定会有弱点。比起弱小的人，我对强者比较有兴趣；但是我所感兴趣的地方，其实在于他们的软弱，我想知道令那种人动摇、失败、遭到击溃的理由为何。在日本社会生活的我，总是自问着我是谁，同时能够回顾自己的人生与一切作为。

KARAKARA：切勿过份膨胀自己的言行举止！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厌恶滥用肢体力量的人，“KARAKARA”剧本的出发点也是如此，我并不是想拍一部聚焦于暴力的电影，而是想把暴力带入电影中。接着，我把焦点放在主角盖博·艾肯（Gabriel Arcand）那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的形象上，这个形象能让人联想到所有为了追求精神上的平静而来到日本的知识分子。

刚来日本不久时，我的室友是一个“禅修男”，他公开地说他已经半年没有和女性发生关系，而且未来也绝对不会需要……而他才23岁！每当我带女朋友回来，他都会对我说教一番。然而，某个夜里，与他只相隔一扇纸门的我，却听见他的房里传来了那种喘息声。与那个夜里发生的事相比，“KARAKARA”的床戏根本就不算什么，由于那件事滑稽得令我捧腹大笑，因此我一直想把它放进自己的作品里。我以前也曾试着用在其他题材的电影中，但效果却不尽理想，相对地，“KARAKARA”则真的非常适合放入那段小故事。人切勿过份膨胀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冥想、保持身心清净，也是没用的，人岂能放弃享受人生的乐趣呢？

在日本拍电影是最棒的经验

在日本拍摄电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最大的优点，就是日本人在踏出脚步之前，经常踌躇不定，然而一旦跨出第一步，就



主人公がサトウキビ畑を自転車で行く、映画『カラカラ』のワンシーン。



息の合った日本人スタッフとの撮影現場は、ストレスもなく集中できるという。

会变得主动而积极。对我来说，工作人员这种认真工作的态度，可说价值非凡。即使工作并不快乐，日本的工作人员从来不会松懈。此外，没有工会组织的存在，也替我减轻不少压力。现在的电影界，已经不会压榨受雇者了，一旦大家都累了，也只能休息；因此我始终无法认同电影界有工会这件事的意义。以魁北克为例，现在滥用权利的其实是劳方，若是要求工作人员在休息时间多工作一分钟，他们就会要求支付加班费。因此，当女演员无法一次完成一个镜头时，给予充分时间让演员完成，对导演来说便成为一种压力，这个问题会使得导演无法拍出好电影。可是在日本，反而是工作人员对我说“一天拍摄的时间太短了”，因为我想要发挥100%的力量，因此力量降到了98%，我就会先停下来。」

PROFILE

1949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克劳德·盖农（Claude Gagnon），昵称“Keiko”、“KENNY the KID brother”等多部国际知名作品，最新作品“KARAKARA”。盖农在1970年代第一次来到日本后，便经常往返于加拿大与日本之间。目前定居于冲绳，并正热烈展多个国际性企画。

